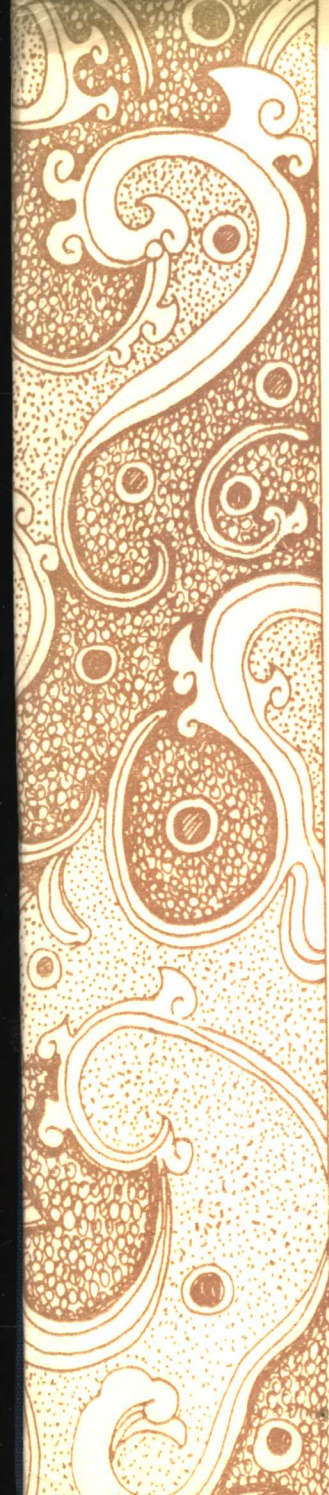


〔北魏〕 酈道元 撰

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撰
陳橋驛點校

水經注

顧廷龍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水經注

〔北魏〕酈道元 撰

陳橋驛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經售處：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 4 印張 25.5 字數 480,000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ISBN 7-5325-0122-1

k·9 定價：13.25元

前言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文化發達的古國，自從先秦以來，就出現了许多涉及各門學科的名著。以後，歲月綿延，王朝興替，文人學士著書立說先後相繼，經不斷積累，匯成我們民族的一宗巨大的文化財富。可惜的是，古代學者嘔心瀝血積累起來的大量著作，在積累的同時，就因天災人禍而累遭毀損。幾千年來，前人爲我們留下的各種著作，真是浩如瀚海，但與此同時，由于不斷地亡佚，我國古籍的損失，其數量也同樣難以估計。

水經注是我國歷史文化寶庫中的一顆光華閃爍的明珠，這顆明珠能够在兵荒馬亂、水火蠹魚的浩劫中幸存下來，真是一種奇跡。

水經注成書的確切年代，現在無法論定。注文中出現的最後一個年代是延昌四年（五一五），說明此時全書尚未脫稿。酈道元于孝昌三年（五二七）奉命出任關右大使，當年就被叛臣蕭寶夤殺害于陰盤驛亭（今陝西省臨潼縣附近）。這說明，此書在這一年以前已經成稿，而且有了若干鈔本。假使在酈道元被害之年，此書尚未完稿，則當然不可能以今日所見首尾完整的全書流傳後世。而根據此書以後首見于隋書經籍志著錄，足見此書當時流傳的鈔本，顯然

就收藏于隋東都也就是北魏首都洛陽。從北魏覆亡到隋一統之間，歷時達五十餘年，這段期間，洛陽曾多次遭受兵燹。楊銜之在洛陽伽藍記序言中所載，東魏武定五年（五四七），他道經北魏故都洛陽，目睹全城斷垣殘壁，廬舍爲墟。此書竟在戰火瀰漫的浩劫之中而安然無恙，真是我國文化史上一次萬分難得的幸運。

可惜的是，此書從北魏直到隋唐，似乎一直爲朝廷所獨藏，未曾流入民間。直到北宋初年，情況依然如此。由于民間沒有鈔本，因此，北宋太平興國至景祐之間所亡佚的五卷，至今無法彌補。

景祐以後，水經注開始流傳于民間，原書既已佚失，加上輾轉傳鈔，以訛傳訛，謬誤連篇。目前所知的此書第一種刊本刊于元祐以前，即成都府學官刊本，書僅三十卷，內容祇有原書的三分之一。此書的第二種刊本即元祐二年（一〇八七）刊本，雖然經過整理增補，恢復四十卷的原數，但從以此書爲底本的明代諸刊本來看，不僅佚失甚多，而且經注混淆，竟至不能卒讀。黃省曾、吳琯等本，在明代曾流行一時，但其實都非佳本。萬曆年間，朱謀埠對此書的校勘下了極大功夫，撰成水經注箋一書，使鄭注在頗大程度上恢復了它的本來面目，因而被清顧炎武稱譽爲「三百年來一部書」云。奠定了清代鄭學考據學派進一步完善的基礎。

入清以後，由于學術研究風氣的發達，學者治學方法的進步，在水經注箋的基礎上，各家的校勘成果，如孫潛、何焯、沈炳巽等各本，都已粲然可觀，而終至出現了乾隆年代的鼎盛局面。全

祖望、趙一清、戴震三家，成爲這個鄭學全盛時期的代表人物。全祖望（一七〇五——一七五五）的成就，不僅因爲他是三人之中唯一獲得高級功名（乾隆元年進士）的學者，特別重要的是因爲他出生在一個鄭學世家之中。他的祖上全元立、全天叙、全吾麒等，世代潛心于水經注的研究，並且有他們家傳的校本，即雙韭山房校本，在這基礎上，全祖望畢生對此書作了七次校勘，天津圖書館所藏的五校鈔本和他身後由王梓材、董沛等整理于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由薛福成刊行的七校本，就是他的研究成果。趙一清（一七〇九——一七六四）不僅是個學有根柢的考據學家，並且還是個知識淵博的地理學家。他在地理學上的深厚造詣，曾經受到性格高傲的戴震的贊賞（三）。他對朱謀埠的水經注箋作了長期的研究，寫成了水經注箋刊誤十二卷。他最傑出的鄭學成果，即是王先謙譽之爲「數十年考訂苦心」（二）的水經注釋。按照四庫提要的評價，此書是除了四庫官本以外首屈一指的鄭注佳本。

這裏值得指出的是，全、趙二人的私交甚好，他們在水經注的研究中，相互切磋，函札不斷。因此，這兩人的研究成果，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彼此貫通的。所以才有清張穆所言的趙書襲全（四）和胡適所言的全書襲趙（五）等說法。事實上，趙書乾隆十九年鈔本（很可能還有同年刊行的家刊本）（六），是全祖望寫的序言，而趙書所採用的大細字書寫形式，顯然是受了全氏所說的「雙行夾寫」和「注中注」的影響。今天天津圖書館所藏的全氏五校鈔本，其中有大量的趙氏親筆校語。我在拙作小山

堂鈔本全謝山五校水經注〔七〕一文中指出：「正文以外，批注甚多，字跡雖有不可辨認者，而要旨悉與注釋本合，則批注出自趙一清之手可以無疑。」這都說明二人在酈學研究中的密切關係。此外，二人之間，還有許多對此書的專題討論，趙氏由于沒有專集，但全氏致趙氏函札，多收入于結埼亭集，至今仍可參閱。在學術研究中的這種相互切磋、相互利用研究成果的方法，顯然有裨于研究水平的提高，是十分可取和值得學習的。後世偶有妄議，當然毫不足道。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在三人中年齒最幼，這就讓他具備了在酈學研究中吸取前人成果，也包括全、趙二人成果的更為優越的條件。他在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就已經有了他自己校定的本子，並且部分付刊（即是日後孔繼涵所刊行的微波榭本）。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他以一介舉人之微，奉詔進入四庫館，憑着他的學問，昂首于翰林行中，而終於在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校定了這個出類拔萃的本子。其成就在殿本校上案語中已概括數語：「凡補其闕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煥然，頓還舊觀。」我在拙作論水經注的版本〔八〕一文中也曾經指出：「殿本以後的不少版本，從疏證上當然比殿本更為詳盡，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還是殿本的水平。」

現在看來，戴震奉詔入四庫館校勘水經注，對於水經注這部歷史名著來說，這是自從一千多

年以前在洛陽的連年兵火之中幸存下來以後的又一次幸遇。戴震是個滿身傲骨不可一世的人物，王國維批評他的爲人過錯，「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¹⁾。或許並不過分。但是他有非凡的才能和淵博的學問，他以驚人的速度在四庫館博覽了當時所有的各種鄭注版本，又以超人的才智立刻作出決定，斷然放棄了他入館前校定的本子（微波榭本）的格局，而以他在四庫館所見到的趙一清水經注釋（或是浙江巡撫呈進的鈔本，或是乾隆十九年的趙氏家刊本）作爲底本。必須指出，在四庫開館的年代，水經注的鈔本和刊本比現在當然要多得多，而憑藉朝廷的力量，當時存在的所有鈔本和刊本，都能被收入館中。在數量衆多的各種版本之中，戴震要在並不很長的時間裏，淘汰許許多多經他過目的鈔本和刊本，包括他自己進館前的校本在內，而當機立斷，選定一種他認爲最優秀的本子，不是一個學識超羣、胸有成竹的學者，是很難做到的。接着，他又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敏捷動作，把大典本和其他版本中存在的精華（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歷年來的研究成果），吸收到他所選定的底本，即趙氏注釋本之中。因而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中，完成這部劃時代的鄭注巨構。使鄭學研究中的考據學派，在四庫開館的千載一遇的良機之中，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沒有像戴震這樣一位實力雄厚而又膽敢猛闖的人物，是不可能在此短期內完成這樣一種一鳴驚人的鄭注版本的。儘管這個本子在內容和體例格局上與趙氏注釋本（十同九九）⁽²⁾，但是，要是沒有戴震選定它作爲底本，並囊括別本精華併入此本，則趙本決不可能實際上身登四庫，將泯泯然散入鄭注一般

版本之列，或許也不是言之過甚的。戴震是四庫館中唯一的舉人，在當時屬於破格錄用之例。據段玉裁所撰戴氏年譜，我們知道戴震是通過紀昀、袁曰修二人向軍機大臣于敏中推薦，藉于之力而上達乾隆，才得以一登龍門，施展他的才能。這當然是千載一遇的機會。正是因為戴震獲得了這樣難得一遇的機會，趙氏水經注釋才有可能幸遇戴震這樣的知音而平步青雲。要是戴震不入四庫館，則戴氏本人在鄭學研究上的成就，當然不過以今日所見的微波榭本而終，而趙氏注釋本，或許也達不到今天這樣的聲望，更何況收入四庫。在後世戴、趙相襲案中站在趙氏一方的許多學者，可惜都沒有看到這一點。既然戴、趙之書「十同九九」，則四庫戴書，何嘗不就是四庫趙書。能作如是想，當年的爭論，或許不至于時曠日久，愈演愈烈。

現在再回頭來看看戴震在四庫館校勘水經注的事。前面已經提到殿本校上案語中對此書成就的概括，即所謂「補其闕漏」、「刪其妄增」、「正其臆改」，此外，這個案語中還說：「是書自明以來，絕無善本，惟朱謀瑋所校盛行于世，而舛謬亦復相仍。」這就說明，儘管戴震在四庫館內能見到的鄭注版本甚多，但他和趙一清一樣，也以朱謀瑋水經注箋作為基礎。上述校上案語中所列舉的校勘成果的數字，是和水經注箋對比而言的。可惜的是，對於這一本在我國鄭學研究史的考據學派中得風氣之先的著作，顧炎武誓之為有明第一，趙一清也「愛之重之」，但戴氏對此竟不出一句好言。這可能也是由于他性格高傲所致。此外，戴震在其校勘過程中，當然也吸取了其他許多版

本的優點，例如，全祖望提出所謂「雙行夾寫」和「注中注」的說法，儘管歷來有人以此爲無稽（二），但戴震却是不聲不響地接受了全氏的這種說法的。他在卷一河水經「出其東北陬」注「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下案云：「此十六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爾雅之間，書內如此類者甚多。」同卷經「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注「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下案云：「此十三字，當是注內之小注，故雜在所引山海經之內。」此外，如卷二河水經「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注「六山名也」下案云：「此四字，……亦注內之小注。」卷三河水經「至河目縣西」注「南屈逕河目縣，在北假中，地名也」下案云：「此三字，亦注內之小注。」如此等等，在全書中不勝枚舉。在戴氏看來，全氏的這種說法，無疑是確鑿的，所以他不厭其詳地在各處加上這類案語。

可惜的是，戴震不知出于什麼動機，他不僅對作爲他校勘底本的趙氏水經注釋以及他引用的鄭學前輩如全氏之流的學說諱莫如深，而把他的一切來自不同版本的校勘成果，統統歸功于大典本。或許他以爲大典本是他一人獨佔的本子，外人無緣得見，因而竟在校上案語中也閃爍其詞：「今以永樂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條參校。」以致乾隆帝也顯然受欺。他在題鄭道元水經注六韻序中說：「近因哀集永樂大典散見之書，其中水經注雖多割裂，而按目稽核，全文具存，尚可集輯。」他的六韻中有一句說：「笑他割裂審無術。」並自注云：「永樂大典所載之書，類多散入各韻，分析破碎，殊無體例，是書亦其一也。」乾隆帝所說的水經注在永樂大典中「割裂」、「破碎」等話，肯定是

由于校上案語中的「各按水名，逐條參校」之語而誤入歧途的。其實，水經注在永樂大典中列于「八賄」韻下，從卷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至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共十五卷，一韻到底，收入了水經注的全部，絕非「割裂」、「破碎」，並無「各按水名，逐條參校」之煩。乾隆帝不查大典原書，輕信校上案語，臣云亦云，宜有此訛。

當然，大典本絕非後來的那些偏激的反戴派學者如葉浩吾所說而爲楊守敬所附和的「直無其事」，而是確實存在的本子。不僅卷首酈氏原序來源于此，而戴震確實也曾以此本對趙氏注釋本作仔細的校勘。祇是戴震對大典本的渲染之詞，顯然出于他當時獨佔了此書。其實，他心裏必定有數，與當時流行的其他明人版本相比，大典本確實有它的不少優點，但是另一方面，宋初類書及地理書上所引的滹沱水、涇水、洛水等，也同樣不見于此書，則大典本充其量也不過是景祐亡佚以後鈔出的本子，而且經注夾雜，體例不同于別本，在許多方面並不可取。對於這一類宋本水經注的價值，戴震實際上是十分清楚的。他在卷二十二渭水經「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注「蓋潁水之會淮也」下案云：「朱氏以爲宋本，實前後舛謬。」在卷二十漾水經「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注「今廣業郡治」下的案語中說得更爲明白：「朱謀埠于其下並云，宋本作廣漢。蓋此書爲宋人臆改者甚多，故宋本亦往往不足據證。」在景祐以後傳鈔的本子中，大典本或許確實比他本要好，但渲染過分，就是名實不符。事情非常明白，假使大典本果真可以作爲圭臬，

則戴震爲何不逕以此作爲底本，何必另求趙本？當然，戴震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現在，反正大典本早已公之于世，而趙本亦尚不稀見，戴震在底本選擇中取趙而舍大典，孰得孰失，這是大家都可以評論的。

殿本和大典本的關係，歷來已有許多學者核對和議論，毋需我再贅述。熊會貞爲了彌補他老師楊守敬曾經附和「直無其事」的武斷言論，特地對兩本作了核對。不過他的婉轉結論：「多從大典，或自訂。」到底還沒有精確的數量分析。關於這方面，楊家駱在一九六二年所發表的抽樣調查是值得重視的。楊氏選擇了全注頁數最少的卷十八渭水爲調查樣本，用大典本、殿本（楊氏稱爲戴校）、趙本（楊氏稱爲趙釋）、注疏本（楊氏稱爲楊疏）四本互校，其結果是：

「統計在異文一百十處中，除楊本異文無與趙戴爭端外，大典、戴校、趙釋三本有異同者凡九十處，其中戴同于趙者四十三處，戴同于大典十二處，戴異于二本者三十一處，三本互違者四處，倘復就趙氏校釋中所謂應作某者考之，凡戴異于趙，亦多陰本趙氏校釋之說，則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復襲于趙，固至顯然也。」（註）

從這個抽樣調查中可以看出，殿本確實是以趙本爲底本，吸取了大典本、全本和其他許多版本的優點編纂而成，這當然是一種可以代表明、清兩學考據學派全部成就的優秀版本。戴震的功績，不僅在于他選定了趙氏水經注釋這部優秀的底本，而且在短短一年多時間裏，以他非凡的才

能和敏捷的動作，擷取各本的精華，彙成一編，完成了這部巨著的編輯工作，把考據學派的酈學研究推進到酈學研究史的頂峰。戴震的過錯，是他過高估計了他在四庫館的工作，從而忽視了學術界公認的道德準則。他的工作雖然是非常傑出的，但是按工作的性質，他祇能作為這部集體著作的主編，而他却一開始就以著者自居，隨心所欲地處理別人的勞動成果，把一部由他主編的集體著作，視作他一人的專著。對於戴震過錯的各種批評，前人議論得已經很多，這裏不再贅述。

此書校上以後，立刻得到乾隆帝的高度贊賞。這不僅因為校上案語中的「三四百年之疑竇，一旦曠若發蒙，是皆我皇上稽古右文，經籍道盛，瑯嬛宛委之秘，響然並臻，遂使前代遺編，幸逢昌運，發其光于蠹簡之中，若有神物捫呵，以待聖朝而出者，亦曠世之一遇矣」一段話正中帝意，而特別是因為乾隆本人對於山川地理素有興趣，他曾經命人查勘過不少河川的源頭，並自己動手撰寫過熱河考、灤源考、濟水考、淮源記等文，對於水經注這部古代地理名著，他當然早已涉獵。四庫校上此書，而且成績斐然，正是投他所好。于是，他就特地為此書撰寫了題酈道元水經注六韻，而四庫官員又把他的著述熱河考、灤源考等置于卷首，以武英殿聚珍版（已刊行于世。在當時，這顯然是一部轟動一時的巨著。于是，各省紛紛傳刻，而後來的酈學家如楊希閔、王先謙、沈欽韓等，在他們的校注疏證中，也都以殿本作爲底本。民國以後，又出版了不少殿本的排印本，例如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和國學基本叢書本、四部叢刊本和世界書局排印本等。中華書局的四部備要本，

係按合校本排印，但合校本的正文也依殿本。我在拙著編纂水經注新版本（七）一文中指出：「自從殿本刊行以後，許多別本都加速消亡。」于是，殿本行天下，而別本次第式微。

以一部校勘精湛的殿本取代許多經注混淆、錯漏連篇的舊刻，當然不是壞事。但不幸的是，這部優秀的作品，由于主編者如上所述的私心雜念和措施不當，竟至釀成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關於這方面，我在拙著水經注戴趙相襲案概述（一）、胡適與水經注（二）等文中已叙其詳，這裏不再贅述。但論戰的進行，却又不幸貶損了這部在鄭學史上空前傑作的形象。有些偏激的學者，在指責戴震的同時，也不擇言詞，竭力貶低殿本的價值。這在實際上當然是矛盾的，假使殿本果真價值平平則戴震又何至于受到來自各方的嚴厲攻擊。因為剽竊之事，自古有之，即在鄭學界之中，黃晟刊本（三）和真州雕板（三），都是直接剽襲朱箋的贗品，像這樣一類十目所視的剽竊者，都不曾落入如戴震那樣四面楚歌的處境。所以，對於戴震的羣起而攻之，實際上反映了殿本的不同凡響。當然，在酣戰之中，許多人都不願冷靜地思考問題，如何把戴震在文德上的過錯和殿本的卓越成就加以區別。成見更深的學者如楊守敬，甚至不顧現實，無視殿本所代表的明、清鄭學研究的成績，而寧願倒退一百五十年，用朱謀埠的水經注箋作為他的鄭學巨構水經注疏的底本，這種意氣用事的措施，實在是非常不幸的。水經注箋作為明代鄭學研究的代表作，當然是不庸置疑的。但是到了清乾隆年代，鄭學研究已經在水經注箋的基礎上邁出了一大步。趙一清所撰的水經注箋刊誤十二卷，

就是針對朱箋所進行的縱深研究。而殿本校上案語中所謂「補其闕漏」、「刪其妄增」、「正其臆改」的共達六千餘字，也是以朱箋作爲基礎而獲得的成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撇開趙戴在朱箋基礎上的重大躍進而繼續墨守朱箋，這種偏執，當然無裨於鄭學研究的提高。幸而熊會貞的晚年，其鄭學思想有了很大的發展，他不僅如上所述地更正了他的老師楊守敬妄加於戴震的無理言論，並且還把楊守敬所排定的「全、趙、戴」三人的位置作了徹底的更改。他刪去「全」字，把「戴」置于「趙」之上。我在拙作熊會貞鄭學思想的發展一文中（三），已述其詳。簡單地說，所以要刪去「全」字，因爲七校本付刊以前，經過王梓材和董沛的整理，已經和殿本作了對勘。因此，在七校本的校勘成果中，孰全孰戴，實在難以區分，所以「全」字就沒有保留的必要。至于爲什麼要把「戴」字移到「趙」字之上？對此，熊會貞畢竟說出了他經過多年深思熟慮的由衷之言：「唯戴之功夫大。」（三）戴之功夫何在？毫無疑問，就是他所主編的殿本。

以上說了很多，這是我們點校和排印殿本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因。無論從鄭學發展史的觀點和學術價值的角度來評價，殿本的優越性都是無可爭議的。此外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原因。大家想必看到，殿本刊行以後，鄭學界除了繼續出版了若干殿本系統的鄭注版本（即以殿本爲底本從事校勘和箋注的版本）以外，又出版了若干不屬於殿本系統的鄭注版本，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刊行的趙一清水經注釋就是其中之一。這當然是一部著名鄭學家所撰寫的鄭注佳本。但

是現在看來，它的價值却完全不能與殿本相比。這不僅因爲如上所述，它實際上早已成爲殿本的底本，而且，現在通行的乾隆五十一年刊行的趙本，是經過梁履繩兄弟整理過的本子。梁氏兄弟在整理此書時，曾與當時已經問世的殿本相對勘，因此，它已經不是趙氏原稿，而是一種趙本和殿本的混合物。對於這一點，即擁趙最力的楊守敬也公開承認：「趙之襲戴在身後。」（四）殿本以後刊行的非殿本系統的另一鄭注名本是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刊行的全氏七校本。如上所述，這一本在刊行以前曾由王梓材和董沛加以整理，他們從殿本鈔入的校勘成果，可能比梁氏兄弟整理的趙本更多。因此已經在頗大程度不是全祖望的原物。胡適把此書說成「一個妄人主編的，一個妄人出錢趕刻趕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偽書。」（三）當然言之過激，但在殿本系統的合校本中，王先謙在卷首例略上明確指出七校本的作偽，因此他在合校本中「一字不敢闖入」。在殿本以後出版的所有非殿本系統的鄭注版本中，規模最大的當然是水經注疏。此書現有北京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影印出版的水經注疏和一九七一年臺北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兩種版本。段熙仲教授和我已經把北京、臺北這兩種影印本合二爲一，作了點校，並且排印出版。此書注疏詳盡，在鄭學史上無出其右，當然遠非殿本可及。但另一方面，此書也具有頗大的局限性。且不必說卷帙浩大，售價高昂，不是一般讀者的購買能力所及，作爲歷史地理學的基礎讀物和一般科學研究的底本，都用不着如此浩瀚的注疏內容。從高一級的鄭學研究來看，在歷史學、考古學、碑版學、文獻學、目

錄學等研究方面，水經注疏當然具有很高價值，遠非殿本可比。但是，酈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如今已經大大發展，學術界現在還需要利用水經注進行自然地理學領域中的地貌學、水文地理學、生物地理學等學科以及人文地理學領域中的城市地理學、人口地理學、農業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和諸如生態學、環境學等邊緣學科的研究，水經注擁有這類內容的大量資料，但楊、熊的注疏縱令詳盡，却也滿足不了在這些領域中從事研究的需要。對於從事這類研究工作的學者，龐大的注疏本起不了什麼作用，顯然不如採用殿本作為底本的省事。總之，從酈學發展史的觀點來看，殿本是目前存在的最完整和標準的版本；從一般閱讀和科學研究的實用觀點來看，殿本是酈注問世以來的最普及和通行的版本。因此，儘管殿本的問世已有二百多年，但現在對它重加點校和排印，仍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也是廣大讀者和科學工作者所十分盼望的。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指出，我們必須編纂一部新版本的水經注。這件工作非常艱巨，需要集中較多的人力和花費較長的時間。現在，殿本的重新點校排印出版，就為這種新版本水經注的編纂邁出了第一步。因為這部重新點校排印的殿本，毫無疑問地將作為未來的新版本水經注的底本。為了這部殿本的點校，我當然花費了不少精力；但是，若和來日的新版本水經注的編纂工作相比，我今天所做的工作就顯得非常輕微了。不過，由於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重新點校排印的殿本，在我國酈學發展的進程中，行將為未來的那一部規模巨大的新版本水經注推波助瀾，因此，